

清初来华传教士德理格与中国礼仪之争

刘亚轩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 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 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的转变表明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 也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关键词: 中国礼仪之争; 德理格; 耶稣会士; 禁约

中图分类号: B929.9;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08)06-0072-05

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 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 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Don Teodorico Pedrini)是遣使会士, 通过研究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和思想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这场著名的争论。

一、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包括2个方面, 一是译名问题, 二是对于祭祖和敬孔的看法。天主教最初入华时, 有传教士将天主教所信奉的造物主“Deus”一词音译为“陡斯”。后来罗明坚(Michele Pompilio Ruggieri)又把它意译成“天主”。利玛窦(Matteo Ricci)认为“天主”一词有天地主宰之意, 与天主教的创世说非常一致, 就沿用了这种译法。他甚至把自己所写的《天学实义》改名为《天主实义》。在《天主实义》引中, 利玛窦说:“邦国有主, 天地独无主乎? 国统于一, 天地有二主乎? 故乾坤之原, 造化之宗, 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1]。”利玛窦这里所说的“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就是他在《天主实义》中多次提及的“天主”。后来, 利玛窦在研读儒家经典时, 从《中庸》、《诗经》等古籍中发现“上帝”和“天”的含义与“Deus”一词非常相近。于是, 他主张用“天”“天主”和“上帝”来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至于祭祖和敬孔, 利玛窦认为它们仅仅是一种没有掺杂任何偶像崇拜因素在内的世俗礼仪, 与天主教义并不矛盾, 因此, 利玛窦允许天主教徒祭祖和敬孔。

利玛窦这么做就是想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 补儒合儒, 从而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利玛窦适应性的传教方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宗教宽容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为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康熙皇帝把利玛窦的传教方法称为“利玛窦规矩”。

继耶稣会士之后来华的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认为祭祖和敬孔是迷信的行为, 从而挑起了中国礼仪之争。由于各个修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不同, 中国礼仪之争愈演愈大, 最后闹到了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那里。1704年, 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Clement XI)颁布圣谕, 禁止用“天”和“上帝”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 禁止祭祖和敬孔。德理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教皇所派来中国。

二、德理格与1715年教皇禁约

德理格1693年加入遣使会, 1710年入华。作为教皇所派的传教士, 德理格坚持教皇禁约。德理格是一名音乐家, 入华后凭着自己出色的音乐才能, 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好感。

德理格“自信深得皇上的宠遇, 且深明康熙的心理”^{[2] 135}。他通过自己的观察, 发现康熙整天处在耶稣会士的包围之中, 于是他就认为康熙之所以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与教廷唱对台戏, 是受了耶稣会士的欺骗。德理格实在是不了解祭祖和敬孔乃是维系中国社会运转的两堵承重墙, 耶稣会士认可中国礼仪是为了适应中国的习俗, 如果不这样做, 耶稣会士就不能在中国立足。

德理格向罗马教廷写信, 说康熙并不坚持中国礼仪, 只要能够减少耶稣会士在清宫的势力, 教皇禁

收稿日期: 2008-07-30

作者简介: 刘亚轩(1976-), 男, 河南南阳人,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令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引起康熙的反对,不会给传教事业带来任何危险。教皇克莱门十一世相信了德理格的一面之词,于1715年3月19日发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谴责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容忍,坚持在中国也要遵守欧洲的天主教仪式,禁止使用中国礼仪”^[3]。

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德理格耍了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他向罗马写了上述信件,另一方面他又奉康熙之命给教皇写信阐明中国礼仪的性质。康熙打算把这信交给即将回国的俄国商队经由莫斯科寄往罗马。迫于康熙作为皇帝的威严,德理格在信中言不由衷地阐明了中国礼仪的性质。“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尔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然画像犹恐画有工拙,不如写其名则无错矣。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4]六}。

德理格阳奉阴违的作法被康熙发觉,康熙火冒三丈。1716年康熙当着在京众多西洋人的面严厉训斥德理格,“你写去的书信,与旨不同。杂草参差,断然使不得朕的旨意,从没有改。又说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并利玛窦以后二百年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尔说多罗、严档的坏处,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与教化王去,倒将相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中国的律例,其可轻饶。尔坏尔教,害了众西洋人。不但现在,并从前的西洋人,都被尔所害。这就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常引人行好,朕尝闻西洋人说:魔鬼引人行不善。由不得他矣。今览教化王处来告示,必定是假的。朕差往罗马府去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4]七}。

为了调解中国礼仪之争,康熙曾于1706年和1708年先后派遣耶稣会士龙安国(Antoine de Barros)、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illier)和艾若瑟(Jeseph-Antoine Provana)、陆若瑟(Raymond-Jeseph Arxo)携带诏书去罗马商议解决礼仪之争问题。龙安国和薄贤士死于海难,陆若瑟病逝于他的家乡西班牙,艾若瑟于返回中国途中在好望角附近死于海难。康熙没有等到自己所派使者的消息,相反却见到了教皇禁约,他不能不怀疑教皇禁约的真实性。

面对康熙的责问,德理格百般抵赖。他说自己给教皇的信的确是按康熙的意思写的,如果与康熙的意

思有出入的话,那是因为他刚来中国,对于中国的言语礼法不甚了解。德理格于1710年抵达中国,此时在中国已经呆了6年之久,他刚来中国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德理格在回答康熙的责问时还无视康熙维护中国礼仪的立场,竭力表白教皇禁约的真实性。德理格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以前在康熙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从而成为他在康熙面前失宠的转折点。所以,方豪说: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德理格是康熙皇帝最不满意的两个人之一^[5]。

三、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和赵昌

耶稣会士在清宫中的势力很大,教廷所派的传教士要想在中国尤其是清官站稳脚跟,必须与他们搞好关系。在德理格到来之前,清宫一直是耶稣会士的天下。德理格到来打乱了耶稣会士独霸清官的局面,这无疑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德理格面临着被排挤的危险。

面对耶稣会士的优势,德理格不是努力改善与他们的关系,而是采取了和他们明争暗斗的策略,企图打击耶稣会士在宫廷中的势力。他甚至用不适宜不正当的手段,竭力诋毁耶稣会士。1715年德理格给康熙秘密上了一道奏折,肆意造谣中伤毁谤耶稣会士,而且还诬告与耶稣会士关系很亲密的官员赵昌、王道化犯了大罪。对于德理格的不实之词,康熙没有相信。相反,德理格的这道奏折却成了日后康熙指责他居心叵测心术不正的证据。德理格告人之事很快为耶稣会士和赵昌等人所知晓,他们对德理格恨之入骨。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说:“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但他的行为却是邪恶狠毒,舌利如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叫人心惊胆战^[6]。”耶稣会士宋君(Antoine Gaubil)在写给盖雅尔神父的信中称德理格“是我们的劲敌”^[7]。

正因为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处于敌对的状态,所以在康熙让德理格给教皇写信时,耶稣会士曾经极力反对。他们唯恐德理格在信中书写对耶稣会士不利的内容。实际上,德理格在这封信中没有说耶稣会士的坏话。相反,他说康熙对传教士很好,康熙极其博学,中国的敬孔祭祖不是迷信。德理格在信中还按照康熙的意思请求教皇选派一些身怀技艺的传教士来清官效力。尽管德理格的这封信是奉康熙之命写的,但是在耶稣会士看来,德理格让教廷派遣身怀技艺的传教士的请求,动机不纯,有壮大教廷势力,打击耶稣会势力之嫌。

赵昌是康熙的贴身侍卫,与耶稣会士的关系很

好。德理格的诬陷加剧了赵昌的仇恨心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德理格。1720年元旦，德理格没有入宫向康熙行三叩九拜之礼。两年后，皇太后去世时，德理格也没有入宫吊丧。这使康熙觉得德理格是在奉行教皇禁约，“不愿遵守向死人与活人行跪拜礼”^{[8] 356}。因而，康熙勃然大怒，他命令德理格必须履行三叩九拜之礼，如果德理格不履行，就要用绳子把他锁拿进宫，逼着他做。德理格得知康熙十分生气之后，就表示愿意行三叩九拜之礼。

赵昌借此机会，把德理格狠狠整治了一番。据与德理格一起赴华的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记载：“（赵昌）是我们的死敌，他不等看见德理格做出些什么，就越格执行了皇帝的指令，下令说我们的伙伴（即德理格）应该马上被当作罪大恶极者对待^[9]。”赵昌让人把德理格捆绑进宫，逼着他屈膝和跪拜。

四、德理格与嘉乐使华

为解决中国礼仪之争，教皇克莱门十一世于1720年派遣嘉乐（Carlo Mezzabarba）使华。嘉乐使团阵容庞大，其成员都是被教廷选中来清宫为康熙服务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长。很显然，教廷此次在使团人员的选择上深受德理格的影响。“教廷想用他们在中国取代耶稣会士传统的‘西学’地位，把康熙皇帝从耶稣会的包围中解放出来”^[10]。

康熙下了一道谕旨，让嘉乐派人回罗马时带给教皇。这道上谕的口气俨然是把罗马教皇当作前来朝贡的蛮夷之邦的国王看待。“意达里亚国教王所差使臣嘉乐，于十二月初三日到来，请朕躬安，兼谢朕历年爱养西洋人重恩。朕轸念西洋距中国九万里，自古及今，从无通贡，兹尔教王竭诚遣使远来，殊属可嘉。尔使臣嘉乐朕念系教王所差，特锡殊恩，备加荣宠。兹因使臣嘉乐遣人回西洋，特寄赐教王玩物数种，以示怀柔至意。特谕”^{[4] 13}。

这道上谕绝对不能直译。嘉乐出使的目的在于执行教皇的禁约，而康熙的答复丝毫不提祭祖敬孔之事，只是一再说自己对传教士和嘉乐是多么优待，这自然令嘉乐无法交差。因而，在是否派人回罗马回报教皇一事上传教士意见分歧。耶稣会士觉得康熙的上谕昭示了康熙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康熙丝毫不提祭祖敬孔之事又正中他们的下怀，故耶稣会士极力主张翻译上谕，派人回罗马。德理格和嘉乐觉得康熙的上谕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主张不派人回罗马。

康熙接见嘉乐时，嘉乐说中国的天主教徒应该

遵守教皇禁约，和睦相处，并请求康熙宽恕以往的事。康熙说：“好，这事就完了，以后不许再提了。”听了康熙这句话，德理格以为康熙已经同意执行教皇的禁约，就向嘉乐贺喜。耶稣会士则说事情糟了，康熙的话颇有讥讽之意，康熙说“完了”其实是不允许嘉乐再提教皇禁约一事。于是在京的传教士争论不断。嘉乐听信德理格的话，埋怨耶稣会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拨离间。耶稣会士则说德理格翻译不忠实。得知传教士之间的争论后，康熙劝告嘉乐不要听信卑鄙邪恶之人，比方说德理格。他说德理格尤其卑鄙，他对德理格与其他传教士一视同仁，努力调和德理格与其他教士的关系，但总是失败^[11]。

康熙让人把嘉乐来华的经过写成《嘉乐来朝日记》，命传教士在上面签名。德理格因为日记中指责他的话太多而拒绝签名。德理格的举动再次惹恼了康熙，他亲笔谕嘉乐：“德理格乃无知光棍之类小人。昨日不写名字，甚属犯中国之罪人。即尔在御前面谕之际，每每关系自己之事，即推开叫别人传说。此等奸人，中国少见。看此先景，恐有带信去，又是一件令教王疑惑难辨严档之事。朕已保全，令尔体面。今只得要严档完此犯中国之罪。大约西洋之叫，不可行于中国，不如不行。诸事平稳，亦无争竞。良法莫过于此^{[4] 13}。”康熙把天主教称作天主“叫”，其气愤之情，跃然纸上。因为触怒康熙，德理格被捕。

德理格被捕后，起先关押在监狱中，后来因为嘉乐的说情，康熙放松了监禁的条件，把他从监狱里提出，软禁在法国耶稣会士的会院里，给他两个房间和一个花园。这就是中国文献所说的“德里格以妄行陈奏获罪，从宽禁锢”^{[12] 卷111 第11}。康熙此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嘉乐面子，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康熙的尊严。同时，康熙的这番举动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华的耶稣会士和非耶稣会士因为中国礼仪问题而纷争不断，但是，在康熙内心深处，他也害怕传教士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而执行教皇禁约。虽然，康熙可以采取禁教的措施，但是他也不想出此下策，毕竟他还需要传教士为他服务。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以法国耶稣会士的势力最强大，把德理格软禁于法国耶稣会士的会院，就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果不其然，德理格的软禁给法国耶稣会士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传教士们指责他们充当狱卒。对此，法国耶稣会士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五、雍正乾隆时的德理格

雍正登基后,大赦天下,德理格得以释放。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说是因为雍正禁教,德理格才被投入大牢,并且还受到了衙役的杖笞^[13]。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说雍正释放德理格是因为北京地震^{[2] 169},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新君即位,一般都要大赦天下,以示爱民之意。据罗马传信部档案处东方文献记载,德理格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他符合大赦的条件。“及朕(雍正)及位后,颁降恩诏,凡情罪可原者,悉与赦免,开以自新。德理格所犯与赦款相符,故得省释”^[14]。1725年罗马教皇遣使来华时就请求雍正援引释放德理格之例释放监禁在广东的传教士毕天祥(Luigi Antonio Appiani)和纪有纲(Antoine Guignles)。

1723年德理格花费白银1850两在北京西直门附近购买了一座住宅,这就是所谓的“西堂”,又称圣母七苦堂,是教廷传信部在中国拥有的第一座教堂。西堂离耶稣会士的南堂和东堂比较远,有60多间大小不等的房子。德理格在西堂的小花园里种了很多花卉和葡萄树。“耶稣会士初不愿教友进传信部教堂,乃不称此屋为‘堂’,但十年后,上谕禁止教友进堂,于是此一属于传信部之建筑物,乃成为北京教友唯一可以行礼之圣堂,因而大受重视”^{[8] 359}。德理格在1726年写给传信部的信中就讲述了西堂的宗教活动情况。他说:“教徒们经常来到西堂。我在教室内履行着所有的神父职务。……我每周内讲道2次。耶稣建立圣体瞻礼,我还举行洗足礼^[15]。”

由于雍正释放了德理格,准许他建立西堂,处置了耶稣会士穆敬远(Jean Mourao),德理格就认为雍正对教会有好感。他向罗马教廷写信,说雍正支持天主教,不会干涉祭祖和敬孔的问题。殊不知,雍正非常痛恨天主教,正是他,掀起了禁教的滔天巨浪。

德理格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禁教风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教皇的禁约只会给天主教带来灾难。因而,晚年时,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完全和解了,他经常与耶稣会士商讨传教事宜,还与耶稣会士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共同签署了一封致被流放在澳门的传教士们的书简。在临终的遗嘱中,德理格明确表示支持利玛窦规矩。因为支持耶稣会士,德理格在罗马受到人们的指控,他不得不向昔日的伙伴马国贤写信,——进行解释,求他在教皇面前代为辩解。

1741年乾隆召德理格入宫,重新担任宫廷乐师之职。德理格本来想谢绝或请求回国,但是鉴于此时中国的天主教事业危机重重,如果自己再拂乾隆的意,必然会使天主教陷入更加威胁的境地,于是德理格就勉强接受了。1746年12月10日德理格死于北京,“上赐葬银二百两”^[16],埋于阜成门外马尾沟的天主教墓地。

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了解得比较深刻,因而制定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其它天主教派坚守天主教义的纯洁,无视中国文化是与天主教文化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对中国文化横加指责。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的转变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参考文献:

- [1]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G].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6.
- [2] 罗光.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M]. 台北: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 [3] MACKERRAS C. Western Images of Chi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
- [4] 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1.
- [6] 严嘉乐. 中国来信(1716-1735)[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34.
- [7]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143.
- [8]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9] 马国贤.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5.
- [10] 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77.
- [11] VIANI S. The Legation of 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 Titula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from The Pope to The Emperor Kang hi, in 1720[M]. London: Scolar Press, 1746: 596.
- [12] 葛士浚. 清经世文续编[M]. 小海: 宏文阁, 1898.
- [13] 伯德莱. 清宫洋画家[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53.
- [14] 阎宗临.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189.
- [15]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述评[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74.
- [16] 吴昱, 韩琦.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75-376.

(下转第47页)

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犯了错误，最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从而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单纯地让他受到惩罚。这既符合孔子“过则勿惮改”“不贰过”的做人态度，也符合其“孝”“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这样一来，自然就“直在其中矣”。可见，以“隐”为“审度”义来理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文从字顺，既有训诂学上的支持，又有哲学上的支持。

今人之所以误将“隐”释为“隐瞒”，是因为“隐瞒”义很常见，而“审度”义在先秦就不太常见，先秦后出现的那些“隐 X”式复音词在各类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地忘掉了“隐”还有一个“审度”的意义，以致误读

孔子的话。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有了两点收获：其一，弄清了“隐”的真正含义。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知道了在阅读古文经典（尤其是哲学性强的经典）的时候，既要重常用义，也要重偏僻义；既要重训诂，也要重哲学，不能只抓前者而偏废后者，否则很容易导致对经典原意的曲解。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1732.
- [3]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11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1118-1133.

The New Explanation of “Fu Wei Zi Yin, Zi Wei Fu Yin”

LI Wei-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 “Yin” in “fu wei zi yin, zi wei fu yin” is usually explained as “to conceal”, however, the point will be considered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istent thinking of Confucius under philosophical analysis, so it's wrong; at the same time, “yin” can be known explained as “to consider conscientiously” through exegetical research. Explaining “yin” as “to consider conscientiously” have both the philosophical bases and bases of exegetical studies.

Key words: yin; new explanation; to consider conscientiously; philosophy; exegetical studies

(责任编辑: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

(上接第75页)

The Missionary Pedrini Coming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LIU Ya-xuan

(History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wa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in Catholic history, which the Pope and Chinese emperors were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had a deep effect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Around it, each Catholic sect argued very fiercely. Lazarist Don Teodorio Pedrini's change from opposing Chinese rites to supporting it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was a cultural collision in a large part, which also showed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id not recognize each other until they clashed and collided.

Key words: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on Teodorio Pedrini; Jesuit; forbidden order

(责任编辑: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

清初来华传教士德理格与中国礼仪之争

作者: [刘亚轩](#), [LIU Ya-xuan](#)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刊名: [衡水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8, 10(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6条)

1.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2001
2. [罗光](#)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1983
3. [MACKERRAS C](#)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1999
4. [陈垣](#)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2004
5.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6. [严嘉乐](#) [中国来信\(1716-1735\)](#) 2002
7.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 1985
8.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9. [马国贤](#) [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2004
10. [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 1998
11. [VIANI S](#) [The Legation of 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 Titula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from The Pope to The Emperor Kang hi, in 1720](#) 1746
12. [葛士浚](#) [清经世文续编](#) 1898
13. [伯德莱](#) [清宫洋画家](#) 2002
14. [阎宗临](#)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2003
15.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述评](#) 2005
16. [吴旻](#). [韩琦](#)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 2006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szxb20080602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24834c02-e1a2-4e60-90fe-9e4d00766c0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